

惠州旧事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舍身崖救险记

□吴思敏

下车的时候遇见太阳雨,不大,于是不带伞。南洋人习惯不带伞。因为老城很多骑楼式房子。

惠州老街亦是骑楼街,下雨根本不用发愁。

天气稍凉,但不算冷,说说逛过老街去喝咖啡,喜欢每天一杯咖啡的我,多日无咖啡,这时带着热咖啡的美好期待在老街闲逛。

边走边看,脚步徐徐,突然遇到一条很瘦的街,我转过头问:“这也算是一条街吗?”

我一边探头往里看,一边在想,是否可以用牙签来形容?“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一巷。”惠州的陌生游客对惠州一无所知,幸好新识的年轻小友L带来历史系的B老师,历史人物和故事便跟着我们一起走。但这巷子瘦得容不得三个人一起并肩进去。

瘦巷子固然稀奇,却非大诱惑,吸引我步上台阶的是“林振雄”。墙上牌子画个箭头写“林振雄故居”。我跟箭头走。只经过房子外头,没进去参观。事先没安排,后来已经明白,旅游这回事不必太刻意,一切看机缘。房子外墙上牌子写“上塘街一巷3号”,下边的说明是“林振雄故居和简介”。大门横批“迎春接福”,“迎春”中间贴一张符,直长形,把“接福”分开,对联一边是“荣华富贵盈门喜”,另一边是“福寿康宁满户”,最底下一字被看起来像三角梅的叶子遮去,全是繁体字。

谁是林振雄?大街巷子口既然钉着故居牌子,定是惠州名人。走老街为看历史,遇见历史名人很自然,生活在风起云涌、波谲云诡的大时代里的历史人物,不论如何坎坷曲折,超越时空之后,在B的嘴里只几句话便道尽一生。“少时聪颖过人,抱负远大。生于世袭官绅家庭,读书时认为非军事不可救中国,报考军校,成绩优异,后获清政府保

送东渡日本学习军事。在日本曾与蒋介石同学,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,从此投身革命事业。”

辛亥革命起义成功,林振雄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团长。听到这里我赶紧插嘴:“广州和武昌起义,是孙中山先生在生的出生地,檳城策划的,所以叫庇能会议,庇能是檳城PENANG的英文音译。”这样一说,感觉惠州和檳城靠得比较近了。

林后来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堂教官,一连串的出色表现,使他在黄埔军校成立时,被委任为管理部主任。一心为国为民,因而受到政府重用,官职越升越高,身负国民政府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谋、中央军法处处长、兼国民政府国防建筑委员会主任等要职,后来因政见和蒋介石严重分歧,1937年南京沦陷前回到惠州。1938年10月,日军打到惠州,林受命统辖省防军警备团并组织广东东江数路民团予以抵抗。1949年,惠州处于无人管理状态,林主动出面组织维持秩序,派人联系共产党队伍,为惠州的解放作出了贡献。后他当选为惠阳县政协委员,广东省政协委员,创办华侨中学,发展教育事业。1964年病故。

林振雄的故事和水东街以及上塘街下塘街的许多房子一样,充满沧桑的痕迹。边走边看那些基本保留原风格的房屋,原来分明全都是大户人家,然而,此时外观破落残旧,没法进去参观,让人唏嘘不已。

缓缓地走,慢慢拍照,把尚未修整好的老屋老铺赶紧留在影像里。听说正在重新修复衰败的老街区,这固然是喜讯,却也叫人担心,一旦修好,会不会和其他地方的老村落、旧城、古镇那样,将原来的风貌,古迹和民居一概淹没在仿古建筑和喧嚣的人声里?是否需要制定法

令,勿让经济效益至上的商业化,轻而易举击退了韵味别致的本土特色?

这一趟惠州行之前我先飞厦门,自香港飞往厦门航班上,观赏的影片叫《明月几时有》,没费时间阅读电影内容介绍,因为导演是许鞍华。

影片从一位老兵郑家彬(梁家辉演)的回忆开始。说的是1940年香港沦陷时期,当时身在香港的抗日文化人茅盾、邹韬奋、夏衍等陷于危险境地,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将自己的生命于不顾,将这群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内地的故事。

不知为何,抗日的电影永远叫人流泪。那是全球华人胸口的痛。有人热血沸腾立刻回国参与抗战,回不了国的人,在海外拼命奔波筹款捐钱。

面对飞机椅子背后小小的屏幕流泪时,没想到自己居然真的来到故事里的其中一个重要现场。水东院子外的铁花大门,里边的木门,全都闭得紧紧的。院子外头两只大象雕像扬着鼻子守护在左右两边。这其中定有什么故事,一般的中国房子,大门两边不是石狮子就是貔貅。院里的树,没花没叶,看不出是什么树种,只有光秃秃的粗干细枝仰往天空伸展。周边静悄悄,一地枯枝落叶,似乎大家都和我一样,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

我们从另外一个门口进去。这栋单家独院的两层半建筑,是惠州最早的欧式房子,带着浓厚民国风的青砖墙上贴着大字的“水东”和小字的“院子”,入门半圆顶颇有欧陆风,木框的玻璃门打开半边,拍照时看见青砖墙上有个牌子,原来这地方旧名叫“东湖旅店”。

为喝咖啡而来,但我久久走不到咖啡桌边,贴在水东院子进门处墙上的两张说明,把飞机上的电影和这栋

老旅店连接起来。电影里那些通过好多舍生忘死的无名英雄(著名的有廖承志和乔冠华)从香港抢救过来的600多位文化名人除了刚才提到的茅盾、邹韬奋、夏衍之外,还包括柳亚子、何香凝、张澜等,他们到了惠州,都秘密入住在东湖旅店。

这事,不论时与空,明明离我那么远,此刻感觉这么近。看电影时流泪,为电影里那些受苦的人物和故事,为在马来亚抗日时期牺牲的那么多华人。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后,开始屠杀华人。日军对新马华人热心为中国筹款抗日的事了如指掌,华人成为重点迫害对象。但凡有怀疑,日军一概不放过,或捆绑推入海中淹死,或活埋、或毒死、或集中枪杀,这一时期,共有30多万华人遇难。

30多万华人,大部分从中国南来,他们在南洋胼手胝足讨生活,一心只想让家乡人生活得更好,还有更年轻的第二代,我们连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,祖国却一直在他们的心里。他们的愿望是赚了钱就回去,却因国难牺牲了生命,从此再也回不到心爱的家和祖国。

步入二厅,左边墙上新制的旧款木门,两边贴上红纸墨字的对联:“春风入喜财入户,岁月更新×××”底下的三个字,被一张教吉他的广告遮去了。广告对象针对年轻人,而现在进来咖啡馆的新一代,还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国的抗战史上,这里是1941年香港秘密大营救的惠州接济站,一个深具历史意义的重要地点。

最后我们在东湖旅店咖啡馆叫了其他饮料,没喝咖啡,喝咖啡非但要有闲情,还要有逸致。

出来的时候,发现对面就是惠州市华侨中学,也就是当年林振雄创办的学校。太阳雨始终细细地落着。

10月19日,我应邀为西华大学校庆60周年做学术讲座,并与西南交通大学的研究生座谈。会后,曾跟随我做博士后研究的段从学(西南交通大学教授)、王珂(东南大学教授)陪我去峨眉山旅游。

10月22日晚到达金顶,入住金顶大酒店。第二天凌晨,天刚蒙蒙亮,我和段从学、王珂便从金顶大酒店出发了。我们要赶到金顶最好的位置欣赏向已久的峨眉日出。我们选定的目标是舍身崖。

这是峨眉山最险要、最神秘的地方。侧身壁立千仞的悬崖,俯看浮云遮蔽的深不可测的谷底,令人浮想联翩。相传峨眉派祖师郭襄女侠曾在此题词曰:“离别绝情,求不得舍身。故而此处被称作‘舍身崖’。这里是绝佳的观看日出的地方,是金顶最靠前的一处悬崖,眼前是一片云海,再无其他遮挡。为了安全,峨眉山景区先是在悬崖顶部修建了粗壮的铁栏,继之又在铁栏后边设立了两米多高的厚重的玻璃幕墙,游客来这里就只能隔着玻璃看日出了。有些人不愿玻璃隔断视线,便只能往后边的山上找合适的位置。

此时,王珂就站在后边高处的岩石上,而我与段从学则紧紧地贴住玻

璃幕墙。东方的天际已出现火红与金黄交织的朝霞,随着时间的推进,霞光也越来越耀眼。到7点12分,太阳终于露面了,弓形的红色轮廓越升越高,光线也越来越亮,等到太阳迸出云海的刹那,万道霞光与眼前的浮云交相辉映,极其壮观,我们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:真美!

当游人们实现了自己的观日心愿陆续散去的时候,我身边的段从学突然发现有个小伙子不知什么时候,已翻过玻璃幕墙,到了悬崖边上。这个小伙子有1.8米的个子,穿一件浅蓝色的羽绒服,他从玻璃墙上边,把手递给我,让我情何以堪!兄弟,快上来!快上来!我也跟着从学呼喊:“别做傻事,快上来!”我们的呼叫引来许多游人,看到小伙子要轻生,大家不约而同地呼喊:“快上来,快上来!”其中有个女孩子,呼救的声

音特别动人:“小伙子,快上来,抓住姐姐的手,姐姐的手是温暖的!”

大家的呼喊,小伙子肯定听到了,但他没有回头,依然站在悬崖边,形成了僵持的场面。此时,段从学把小伙子手机递给我。我知道这是让我用手机报警。可这小伙子的手机我不会用,便用我的手机打120、110,一时听不到回应,转念想,即使120、110的人能来,也要不短的时间,还是赶紧找到景区的警察或工作人员为好,便朝朝的那排香火售货台跑去,一位售货小姐指远处的一牌子说,那上边有景区电话,你们赶紧去打。

我年纪大了腿脚不行,便对身旁一位年轻人说:找到牌子上的电话,让他们快来救人。年轻人毫不犹豫,立刻跑过去给景区管理处打了电话。我便匆匆赶回舍身崖,等到距玻璃幕墙两米远的时候,只见那个想要跳崖的小伙子已被群众的不断的呼唤声所感动,他回到玻璃墙边,手刚伸出来,就被段从学和身旁的一位年轻人(上海天成律师事务所文宏)紧紧地抓住,一下子把他拉过了玻璃幕墙。

此时,游人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!那位呼喊“姐姐的手是温暖的”的女孩子,满面泪水,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也是热泪盈眶。

小伙子刚一落脚,我便把那个手机递到他的手中,对他说:“这是你的手机,快给家里打电话,报个平安吧!”小伙子接过手机,却没有说一句话。我一摸他的手,颤抖得厉害,看来他的情绪还没有平复。

我们把他拉下离开舍身崖一段距离的石头坐下。这时王珂走过来,就蹲在他的面前,劝导他,劝慰他。王珂曾提出“诗歌疗法”,对心理疗愈颇有心得,此时他的心理救助法有了用武之地。经过一段时间开导,小伙子的心情慢慢平复,开始简单地回答问题,才知道他父亲已逝,母亲改嫁。王珂把自己的电话和微信留给他,希望与他保持联系。

此时,景区的警察也赶到了,他穿着黑色大衣,上边有“旅游警察”四个字。他拉起了小伙子的手,往外走。我对那位警察说:“你们带他回去,先问问他有什么困难,帮他解决一下,以免他再走这条路。”警察说:“放心吧,我们知道了。”

分手前,从学、王珂、我、两位现场的女孩与那位小伙子合拍了一张照片,祝他好运。然后,我们目送警察抱着小伙子的手,迎着清晨的微风,朝着灿烂的阳光走去……



亘古·星海(国画)

□关坚

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农贸市场从业人员要注意

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

那些寄宿的日子 一为文人

□龙建雄

□杨阳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从12岁小学六年级到17岁去当兵,这段时光我都是离开父母在外求学。离开父母住校,心里最大的窃喜就是不用受父母管束,空气是自由的,校园角落里每一处地方都是自由的,整个人更是自由超凡。不过,除了自由的感觉以外,心中还是对接下来的独立生活暗自慌张。说是宿舍,其实就是一间老旧教室里摆满了上下铺,一张木床挨着另一张木床,除不堵住两个门口外,床铺在宿舍里形成了一个标准的“回”字形。屋子中间花电线上挂着一盏50瓦泛着黄色光的电灯泡,南北两边各有两大格用报纸糊着的窗户,大家带来的木箱子、桶或脸盆,都是放在下铺底下靠里墙,虽说没有条件整齐划一,但学校还是有要求不能显零乱。

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做了上下左右邻舍,兴许都是头一回寄宿的原因,第一个晚上大伙睡得都不安稳,不是你翻身,就是他轻轻地呼叫邻铺,要么是戳一戳上铺睡觉了没。深夜的校园很寂静,宿舍里散发着一股酸酸酸的味道,有同学发出“咯咯咯”磨牙声,窗外不时传来山上不知名动物的“咕咕咕”声,我开始有一点点的害怕,脑海里有一丝丝遐想,想爸爸和妈妈与自己6岁的可爱弟弟,想着想着,不知什么时候稀里糊涂就睡了过去。

寄宿的一日三餐在伙房排队打餐,那时叫搭伙,老的计划经济和刚刚开放的市场经济并轨存在,食堂这一概念在乡下属于外来词。我们需要每个月背一袋30余斤的大米去学校,交纳3块钱加工费,然后换取一两、二两、三两的一叠塑料饭票。很郁闷的是,在家里由父母反复称好的斤两,到了厨房师傅那儿就会少个一两斤,仔细想来,一路奔来不曾见自己撒过一粒米。我胆小,不敢跟厨房的人辩解,最后只能听之任之。每餐的米饭就用粮票兑换,菜大部分时间还是要用钱去买:五分钱的青菜,一毛钱的鱼,最贵的是二毛钱的鱼、肉。

春节过后到立夏之间的气温比较适中,我们大多数寄宿的学生会带上几罐干辣椒腊肉、剁辣椒、霉豆腐、洋姜等。想要省钱,那就必须好好地利用这些带来的菜过日子,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是一小坨豆腐乳对付

一碗米饭。学校里打饭打菜的地方就是一个窗口,窗口木框不知经历过多少届、多少学生的磨蹭,虽然老旧不堪,但黑得锃亮,像抹了一层厚厚的油。打好饭菜之后,大家就在操场边石板乒乓球台周边,或围成一堆,或席地而坐,遇雨则在教室外的走廊里解决。那时吃饭是学校里一道很美的风景,男女学生绝对地分开,要不然就会有暧昧的传闻,这很容易遭教导主任约谈。聚在一起吃饭就是一场临时搭建的分享会,大家会评一评谁家剁辣椒最好吃、酸甜辣合适,谁家的腊肉最地道、色香味俱全。偶尔,有人不小心碰碎了别人的一玻璃瓶豆腐乳,掉在泥巴地也没法收拾,只好拿自己带来的干菜等量赔偿,然后这一周除了靠同学救济,就寻思着如何靠五分钱一餐的青菜熬过剩下日子。

洗澡是学校寄宿生活里最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很多次从学校回家里,耳根子后面,衬衣领子上,一股股留有印痕很深的污垢,这会成为那时村子里眼睛比较“尖”的八卦阿姨们的窝囊。学校里的澡堂,热水肯定是不奢望,除非你花钱预先从锅炉房买过一壶开水。澡堂里水龙头流出的水永远细得像头发丝一般,如果你不去与水时间竞赛,很可能洗到一半就没有了水。上高中那会儿,男生宿舍前有一口水井,夏天洗澡绝对地要抢,抢位置、抢井里的水量,毕竟水少人多。我和要好同学几个常常结伴一起去,一来人多势众,也可以互相帮忙,譬如打水洗头、擦个背什么的,另一个是我有“小九九”,蹭同学洗发水。说起来现在的孩子不会相信,我到16岁才用过洗发水,那时一头乌黑的浓发三七开,用过海飞丝就基本上没有头皮屑,比自己的肥皂不知强多少倍,心里直偷着乐。

寄宿的日子,对我来说诱惑最大的是校外火爆的电子游戏厅,梦想的奢侈品是一台普通的随身听,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,我清楚自己口袋里那几块钱有更需要的地方,所以连游戏厅的门都没有进过。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,随着寄宿环境一年比一年好,父母给的零花钱也一学期比一学期多,我慢慢品味着成长,懂得了珍惜,学会了知足,这种感受一直伴随着到现在。

文人自视高。谢灵运就说过:“天下才共一石,曹子建独得八斗,我得一斗,自古及今共分一斗。”谢灵运还有点自知之明,不敢凌驾于“七步仙才”之上。但他难道不清楚早他几百年的有孟子、庄子、屈原、荀子,才华名望都在曹子建之上吗?就是同时代的陶渊明,对诗歌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,也要甩谢灵运几条街吧。

时代在发展,文人的自大,似乎并未稍减。清代有个叫王尔隽的,胆量之大、脸皮之厚,非谢灵运可比。他用文绉绉、拐弯抹角很艺术地自夸:“天下文章数三江,三江文章数吾乡,吾乡文章数吾弟,吾为吾弟改文章。”这口夸得也没边了。

也有几个不把文人身份当回事儿的。汉代大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玄学家扬雄,博学多才,年轻时写出很多广为传颂的大赋,上了年纪后,他对文章诗词歌赋,却表现出极大的蔑视。甚至认为大文人要做就做思想家,写出像《易经》这样有原创性的煌煌巨作。他在《法言·吾子》里自问自答——或问:吾子少而好赋?曰:然。童子雕虫篆刻。俄而曰:壮夫不为也。

一生不肯事清的大儒顾炎武,有句名言,下的是全称判断:“一为文人,便无足观。”

自许和自否过甚的文人,扭捏作态,鄙人皆以为然。忽想起鲁迅的诗来:“运交华盖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干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。”忘却自我,方可不受名利羁绊,潜心悟学,勘察世物。做个扫地僧,也很好。